

近學介紹之二

蔡元培

—(1868~1940)

□秀先□



「蔡元培也只是一個書生，但是一個很像樣子的書生；他也是中國新舊過渡時代的一個人物，但別人過渡或者永遠在過渡中，或者永遠過渡不過去，而他却是一個真正渡過去了的人物！」

以翰林而參加革命，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人。以一個革命者而把他畢生的精力貢獻於教育與文化事業，而自身又能夠不斷的向新知方面求開拓，他也是最徹底的一個。」

——左舜生中國近代史話初集

民國六年北京大學為紀念創校二十週年，曾刊行了一本紀念冊，其中有首廿週年紀念歌：「棧樸樂英材，試語同儕：追憶遜清時創立此堂齋，景山麗日開，舊家主第門程改，春明起講台，春風盡異材。滄海動風雷，絃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

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這位蔡先生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北大校長，一代宗師蔡子民先生。

蔡先生生當我國有史以來世變最亟的時代，他個人是科舉出身，可以說在傳統學問方面已有了相當的成就，而他在四十一歲後，曾三次去德，兩番留法，花在國外讀書的時間，一共是十三年，所以他對西方文化認識的深刻，觀察的透徹，是同時代其他藉助譯本西書，和留學日本的前輩學人，所無法企及的。誠如中央研究院同人，在他六十五歲生日時，上書所稱的，蔡先生是個「華中土文教精華於身內，泛西方哲思蘊衍於物外」的一代通人兼學人。以他這樣精湛的學養，身處在這種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裡，蔡先生遂得以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成爲一個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代表性人物。至於先生志行的高潔，人格的圓滿具足，不但足爲國人楷模，且可爲人羣表率，真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世界完人。我們不妨從他的事功、學詣、志懷、

性行各方面，來窺此一代宗師的風儀。

蔡先生「身材矮小，行動沉穩」，貌似平凡，却有過人的智慧。他自述「子民以十七歲補諸生，自此不治學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爲駢體文。偶於書院中爲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其於鄉會試，所作亦然。」據說蔡先生應鄉試時，曾做了一篇怪文，劈頭就引用禮記裡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句話，終場他就是以這份卷子得中舉人的。吳稚老也是因爲這篇怪文，而在未識子民先生以前，就知道他是能作怪八股的人，「意其人或一怪誕踈弛之士，不知當時彼乃二十三、四歲之恂恂儒者。」庚寅年（一八九〇）他會試及第，壬辰年（一八九二）殿試中二甲進士，而會試及第那年，他才不過二十四歲，可以說相當早就出山了。以後的幾年裡他任職翰林院，並在李慈銘家中做家庭教師。

蔡先生自稱「自甲午以後，朝士競言西學，子

民始涉譯本書。」這是他和西方文化接觸的開始。而在戊戌政變後，「元培深致惋惜，歎其寡助致敗，謂改革新排舊必先培養人才，觀清廷政治腐敗無可挽救，遂棄職南歸，絕意仕進，從事教育，其思想革命自此始。」所以他一回到紹興故里，就受聘為中西學堂監督（校長），以後又到上海，曾經代理過澄衷學堂總理，又擔任過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更在一九〇二年，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愛國女學校，由他自己兼任校長。同年，他又和留寓上海的一些教育家組織中國教育會，並被推為會長，而這個教育會則是我國有史以來頭一個的教育團體。稍後他又協助成立了愛國學社，自兼教員並聘吳稚暉、章太炎等擔任教師。尤有進者，蔡先生「所至提倡民權女權，與物競爭存進步之旨，張團演說會，及蘇報，皆與愛國學社相聯繫。」「是時愛國學社幾為國內唯一之革命機關矣。」第二年（一九〇三），著名的「蘇報案」發生，章太炎被捕，鄒容自首，蔡先生因有意到德國留學，在案發前一個月到青島學習德語，所以得以身免。一九〇五年，他加入同盟會，並由總會指派為上海（或作東南）支部部長兼主盟人，另外還賃屋學製炸彈，如此以翰林而參加革命，自以先生為第一人。

一九〇六年，「清政府議派編檢出洋留學，子民遂進京銷假，請留學歐洲。無何，願赴歐美者人數太少，而政府又絀於經費，悉改派日本。子民不願。」於是進入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的譯學館，擔任國文教員兼授西洋史。一直等到他四十一歲那年（一九〇七），他才得償夙願，私費赴德，頭一年在柏林學習德文，第二年進入萊比錫大學，在那兒聽講前後凡三年，其間以譯著自給。他在大學裡，選修的課目則於「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之講義，凡時間不衝突者，皆聽之。尤注重於實驗心理學及美學。」

辛亥武昌首義後，他曾回到柏林協助宣傳，等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又受命為首任教育總長。在他任內，頒佈新的學制和新的課程標準，例如在普通教育方面廢止讀經，大學校則廢止經科，而以經科分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又以大學為研究學理之機構，宜特別注重文理兩科，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云。」而為了提倡成人教育和補習教育，教育部更在原有的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外，增設社會教育司。同時蔡先生並曾發表過「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以為「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所以這篇文章不但是民國初年教育宗旨的張本，而且可以說是他整個教育思想的代表。至於「美育者，子民在德國受有極深切之印象，而願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民國元年二月，蔡先生曾率團北上，迎袁項城南下就職不果。等到臨時政府北遷後，他仍留任教育總長，力主實行責任內閣制，因此和不屬於同盟會的閣員起爭執，「子民憤然，謂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於是不顧袁氏的慰留，也不聽當時正在舉行的全國教育會議與會人員的挽留，毅然和其他四名隸屬同盟會的閣員一起辭職。然後攜眷赴德，再入萊比錫大學研究。民國二年因宋教仁被刺，他會歸國討袁，那年秋天，再同吳稚暉先生等去法國，住在巴黎郊外。次年歐戰爆發，移居法國西南境，如此居法三年，一方面自修，一方面著述；並曾協助李石曾先生辦理勸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目的。民國五年又籌組華法教育會，同年編有「留法華工學校講義」四十篇，今天各大專院校採用作教材的「德育講義」，就是其中的三十篇。

民國五年冬天，北京政府的總統黎元洪發表蔡先生為北大校長，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大腐敗，進去了，若不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蔡先生於是在民國六年一月四日就任北大校長，而在一月九日北大開學那天，更針對當年學生不務實學，只圖在若干年限後，得到一紙文憑，或者憑着那些有地位的老師做靠山，以求得較好出路的錯誤觀念，指出「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的求學宗旨。另外為了徹底改革北大的校務，他又採取了一連串重要的措施：停聘不够水準的外國教師；提議採用學分單位制；廢止三年制舊預科，別於文理法三科附設二年制預科，又集中全力整頓文理兩科，將職業性的專門科目如商科、工科歸併到同性質的其他國立學校。「並提倡進德會（……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游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通常論者都以為蔡先生在北大數年中，最重要、最難得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那種「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方針，真值得我們在此細說一番。原來當他初到北京時，就接受湯爾和先生的推薦，聘請陳獨秀先生為文科學長，由於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主持人，於是間接地認識了「新青年」的一位海外投稿者——胡適。胡適在考完博士後四十九天，就回

到上海，民國六年九月裡，正式應聘為北大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上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委員，自從胡適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同志，所以與會較高一點。」自此以後「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又儘管「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傾向於新的進步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對於這種兼容並包的態度，蔡先生自己說得十分清楚：「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就讓他們並存。」所以蔣孟鄰先生說那時北大「爲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辯，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語。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裡，到處討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這是何等風光，多麼令人

就在蔡先生這種同時具備着寬宏的器局，和偉大識見的校長領導下，北大面目爲之一新；而北大師生的言論思想行動，也就不只是對我國當時乃至於日後社會、政治各方面，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和在他主持北大任內，先後發生的三個運動有着莫大的關係。它們分別是白話文（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三大運動，蔡先生可以說都是身預其事的人物。

照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中的說法，「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語言來創作新中國的新文學——來創造活的文學，人的文學。」此外羅家倫先生對新文學運動也有着非常簡明的闡釋「這是一種有意義的文學解放運動，以現代人的語言文字，表示現代人的思想感情，不必披枷戴鎖，轉彎抹角，還要穿前人製就的小腳鞋子，才能走過狹窄的過道。並且就可把這種『國語的文學』來形成『文學的國語』，使全民的思想意識都能自由的交流，而鞏固中華民族的團結。」蔡先生是深明時代潮流的人，依他看來「白話既適合社會生活上的需要，而古今中外的歷史，又皆證明此爲一種自然的趨勢。故提倡文言，實爲違反潮流。」他又認定「國文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白話與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佔優勝的。」但在另一方面，他顯然要比胡適他們來得保守，他說「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值得一提的是，當民國八年反對白話文的聲浪達於最高潮時，林琴南先生曾寫信給蔡先生，攻擊當日幾個提倡白話文的教授。並且希望他「守常爲是」不要大事興革。於是他發表了一

張目。後來林琴南又作了幾篇小說，醜詆蔡先生他們。守舊勢力甚至於還想運動安福部的國會出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所以趙家銘先生說「在這種陰暗的文風下，蔡先生站在第一線，爲他的小兄弟們做守護神，這種功德，實在是值得歌頌的。」

而由新文學運動擴大而來的新文化運動，它的概念本來就是相當模糊的，即使在當年也並不太能令人滿意，作爲這個運動要角之一的胡適，就曾這樣地批評過它「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着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麼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胡先生對這種膚淺的介紹工作，極表不滿，所以特別要求北大的師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工夫。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高等學問入手不可。」他的結論是「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所以數來數去，這個運動算得上稍微具體一點的內容，選得說是胡適所提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四件要目。其中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及對傳統的重估，在當時確會引起保守份子的不安與不滿。蔡先生在覆林琴南書中，除了對他辦學的方針有所說明外，對新文化運動也表示同情與支持。等到外界以洪水猛獸來謾罵稍具新思想的青年時，他又起來說話了，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洪水與猛獸』，主張『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驅逐狎鷗的猛獸。』這篇短文的結尾是這樣的：『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給馴服了

。幾年以後，那新思潮的洪水果然把北洋軍閥的猛獸給捲走了。

至於說到迄今猶未能有定論的五四運動，那和蔡先生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所謂『五四運動』，有兩個顯然的含義：其一是政治的，其一是思想文化的。」前一個含義可說是狹義的五四運動，「五四」和「六三」是它的內容；後一個含義則是廣義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互為因果，那也就是說「五四運動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新文化運動也廣泛地澎湃地由五四運動而擴大。」

關於狹義的五四，當年的健將羅志希先生有着扼要地描寫「五四運動也很簡單，他是為山東問題中國在巴黎和會裡失敗了。國際間沒有正義，北京軍閥官僚的政府又親日恐日，辱國喪權，於是廣大的熱血青年，發生這愛國運動。這運動當初的起源是在北京大學，但是一轉瞬就普及到全北京大學生，彌漫到全國。不久全國工商界也就很快的加入，這是中國第一次廣大的青年運動，也是全國性的民衆運動。所以這運動不是北京大學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數身預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至於它發生的原因，據羅先生分析起來「就北京大學而論，學生從軍閥的高壓和官僚的引誘中，不顧艱險，奔向一條救國的道路，實在是蔡先生轉移學風的結果。蔡先生一面在校提倡大學生的氣節，一面於第一次大戰停後在中央公園接連三天的演講大會，以國際間的公理正義來號召。嗣後不過數月，巴黎和會竟有違背公理正義的決定。（原注略）當時北京軍閥官僚誤國賣國的逆跡，又復昭彰，於是五四遂在這適當時機而爆發。還有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漢朝和宋朝大學生抗議朝政的舉動，也給大家不少的暗示。」

五四當天，有三十二個學生被捕（其中包括後來編過「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的孫德中教授），蔡先生日夜與各校長進行營救工作，直到五月七日被捕的學生才全部獲得保釋。先是蔡先生會對學生聲明，同學們一日不保釋，他絕一日不放棄營救的責任。當學生獲釋後返校，田炯錦先生有段感人的記載：「記得被捕同學釋回之日，很多同學於清晨會集在文科操場，蔡校長亦到場，命排長繞一列，備釋回同學站立，使大家容易看到。逮他們歸來登上長橋，看見同學羣集，乃均泣不成聲。而迎接的同學，亦隨之大哭不止。蔡先生說：『今天被捕同學釋回，大家應該高興，請不要哭。』言次，他亦淚激激下。」而在被捕學生釋放前，曾有謠言，說有人想加害蔡先生，有學生勸他離京，他則堅持誓言絕不願逃避責任，又有人勸他改乘汽車，較安全，他也不肯。田先生還親見他扯去許多要打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標語，說那非但於事無補，反而徒增被捕學生保釋的困難。「蔡先生愛護同學的熱忱與負責，使大家衷心感激敬佩。」所以當他在實踐了保釋學生的諾言，留下那傳誦一時的辭職啓事「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我欲小休矣！……以後，一人

學生，集中起來關在北大法科、理科兩處。由於六月四日上海的學生，運動商人罷市三天（這是學生代表向商會負責人下跪求來的），北京政府才驚慌了，五日看守學生的軍隊悄悄的撤走，曹陸章三人也被免了職，奮鬥一個月的結果，學生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而廣義的五四運動，內容相當複雜，也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這裡只能簡單地說一下。狹義的五四運動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自不待言，五四前北大教授和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等所鼓吹的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可以說對當時學生的行動有着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五四以後，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所產生的白話期刊、報紙，本來是用來討論政治運動的，後來都變成了介紹新思潮最有力的媒介。孫中山先生在致海外同志書中有過一段極為精闢的議論：「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攫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啓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界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續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

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這段文字不但對狹義的五四運動有公平的評價，而且可以說是對廣義的五四運動的最好說明。」

另外，左舜生先生先對廣義的五四運動，也有他個人深入的看法：「後來有人把這一運動的目標，歸納於『民主』『科學』，雖然已算扼要，但仍嫌狹隘：『五四運動』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種熱情，它的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對文學藝術要求的熱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種運動中所沒有的。單調的民主可流於形式，單調的科學可陷於枯澀，賴文藝以潤色之，然後才做到篤實光輝，使人不倦。」我們不難想像，廣義五四運動的這種特色，和「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之一的蔡先生一定有所干係。蔡先生平時對美育的重視與提倡，使我們相信左舜生先生所言不假。

五四以後蔡先生離京數月，學潮慢慢平息下來，在政府及北大師生一再地挽留下，他在九月回校復職，北大的學術研究工作，也就更加地積極。而為了防止以後不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影響到校務的推行，蔡先生遂仿效德國大學的辦法，建立了教授治校的制度，教務分任，事務合議。這制度在政治局勢混亂的當兒，確不失為一種安定學校的好辦法。民國九、十兩年間，先生奉命到歐美考察教育，途中先後接受法國政府的贈助及紐約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民國十二年，先生因司法部長羅文幹遭受非法逮捕，「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作者按：當時的教育總長為了討好軍閥，不惜干涉司法，提議拘捕羅氏），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於是再度提出辭

呈，退居天津，那年秋天更遠適歐洲，以示決心。

如此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才又應教育部電召回國，在這三年裡，他往來於法、德、英、比諸國，曾經協助吳稚暉、李石曾先生辦理里昂中法大學，又到倫敦運動退回庚子賠款，民國十四年他更不肯放棄進修的機會，在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回國後，在七月八日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蔡先生回憶他在北大的經歷時說「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事實上，當蔡先生在校之日，環境的惡劣是後人所難想像的，傅孟真先生就曾說過「但試想當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具人形之識字者，寥寥可數，蔡先生一人在那裡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所以在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長的時日裡，不只是他個人事業的巔峰，而且要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佔上相當輝煌的一頁。

民國十六年以後，蔡先生常以黨國元老的身份，贊襄中樞，但也始終担任着全國教育或學術最高機構的負責人。譬如國民革命史上重要的「清黨」（民國十六年）就是由吳稚暉、蔡先生等一班元老所領導的，他們大膽控訴共產黨「亡黨賣國」的陰謀，要求「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這項歷史性舉動，不但避免了赤禍的提前來臨，還曾促成了蔣總司令的早日完成全國統一。另外一項在民國教育史上非常突出的新制度——大學區制，也是在他手裡締造起來而又親手予以結束的。這項制度的發起者是李石曾先生，實際負責推動和執行的則是蔡先生，他們鑑於法國實行大學區制的成功，有意加以摹仿。這制度的要旨，在於將全國分為若干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內的各種教育

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他們的目的無非在推行「行政學術化、機關學校化」等新概念；並想利用大學的多數學者、設備，來從事教育設計；預期待行這制度，可以收到分區設置，因地制宜，及富有機動性可以隨時改進等好處，消極的則可以避免政潮的影響。可惜事與願違，蔡先生出任大學院院長年餘，只在江、浙、北平試辦過三個大學區，就因和人事、行政、財務上的種種傳統觀念發生衝突，而不得不「從善如流」，取消三大學區，並將大學院改回為教育部。

早在大學院時代，蔡先生就與李石曾、張靜江諸先生，提議設立中央研究院，中研院正式成立後由他兼任院長。十七年政府改組，「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先生不願兼任部長，並辭去所兼任之監察院長及司法部長，辭函中有『去志早決，義無返顧』」等語，先生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辭職獲准後，蔡先生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按其時尚有北平研究院，由李先生任院長），以後中研院改隸於國民政府，還是由他擔任院長。二十年冬，先生曾代表中央與粵方洽商共赴國難辦法，可見他雖然不再參預實際的政務，但對國事依然很關心。不過畢竟他晚年最努力的還是中研院，一直到民國廿九年，蔡先生病逝香港時為止，他始終負着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名義。」

不必諱言，蔡先生晚年思想似乎稍左，與魯迅等較近，而與胡適他們稍遠。林語堂先生回憶起他在中研院擔任英文總編輯的情形時曾說：「這時有所謂民權大同盟，真是莫明其妙。那時開會列席，無非是蔡先生、楊杏佛（作者按：楊氏時任中研院總幹事），魯迅、宋慶齡，及共產小姐（A. G. Smedley）與我數人而已。你想保障人權，蔡先生那

有不贊成？我那有不贊成？其時我們蒙在鼓裡，給人家利用。後來牛蘭事件發生，共產小姐及宋慶齡僕僕長途坐火車到南京去極力營救。我才恍然大悟。活到老，學到老。人權保障，完全不是那回事，後來楊杏佛遇刺，民權大同盟也就此告終。」左舜生先生對這件事也有非常嚴正的看法「總之，蔡先生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而正誼感極強的人，他只能服從理性，決不會屈於威武，在他全部思想中，儘有多少是偏左的，但決不是今天的共和靠攤分子所得而假借。」

另一方面，對於蔡先生偉大的人格，胡適之先生曾經推崇備至，認為「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只有這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胡先生這種說法並不能算是過譽之辭，因為蔣孟鄰、傅孟真這兩位會親炙過蔡先生的人，分別有過兩段說辭，很可以支持他的看法。首先蔣先生在對北大學生講到蔡先生的精神時說「(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的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的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裡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其次傅先生在談到他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時也說「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觀。先生歿後，此兩種偉大文化在中國之寄象已亡矣！」此外左舜生先生另

有他個人的見地「蔡先生之為人，有他狂的一面，也有他狷的一面；他的學風，有他高明的一面，也有他沉潛的一面。狂與高明的一方面，受中國文學和法國啓蒙時期以來思想的影響最深；狷與沉潛的一面，受中國儒家、理學，乃至德國學風的影響也不小。」左先生雖無緣親接蔡先生，但這番觀察可說是去事實不遠。

比較起來，蔡先生性行中屬於狷的成分似乎更為明顯，所以胡適之先生在蔡先生九二誕辰紀念會上的報告，就特別指出「蔡元培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古人所說的狂狷的「狷」。孔子說：「狷者有所不為也」。蔡元培先生常說孟子的一句話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有所不為」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肯把人格拖到污濁裡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不是消極的。所以說：「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趙歧說：「不為非義，義乃為申」。這句話就是蔡先生在民國十二年去職後（作者按：指為抗議羅氏被捕辭職一事）宣言中所說退的舉動，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蔡先在辦進德會時，有「三不主義」，「七不主義」，即是有不為。他在民國十二年的抗議更可以表示他的有所不為的精神。「這種有所不為的精神顯然和他清代時代深為服膺的宋儒理學不無關係。」

蔡先生對他自己的性情也曾有過一番檢討「我個人的性情，是曾經吳稚暉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起來，覺得他的品評很不錯」。這也正是稚老所說的「蔡先生之為人，真是所謂：「君子而不同」。他和那一個人人都很和氣，然而他有一個「自己」。絕不是因為做人和氣，就會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誰和他相處，都像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樣，如坐春風之中，

不過雖坐春風之中，很感到有一種嚴肅之氣。」陳仲甫先生在追憶蔡先生的懿德時，也有段類似的看法「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然而儘管平時蔡先生的脾氣好得出奇；但也有氣不過的時候，只是機會太少罷了。當年轟動一時的北大講義風潮，就惹得他發了一頓狠，面對着那些反對繳講義費的學生，蔡先生捲起了袖子，揮舞着雙拳，喊道「你們這班懦夫！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那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羣衆在他面前圍了個半圓形。蔡校長向他們逼進幾步，他們就往後退幾步，始終保持着相當的距離。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為正義之獅了。」還有一次更為有趣，北伐勝利後，傅孟真先生有天在蔡先生家中吃飯，帶着幾分酒意，傅先生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們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傅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蔡先生聽到這裡，不耐煩了，說：「這除非你作大將。」蔡先生說時，聲色俱厲，我的酒意也便醒了。」由這兩則故事看來，足證蔡先生還是個具有真性情的人。

另外某些對蔡先生認識不够深刻的人，只見得他有求必應，就以爲他只不過是個十足的好好先生，不知其中另有一番大道理存在。傅孟真先生獨排衆議說「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爲濫，這全不是事實，是他在一種高深的理想上，與衆不同。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

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因此，蔡先生晚年之所以會參加什麼「民權大同盟」，說穿了，也不過是人家利用了他的這點「赤子之心」罷了。

最後我們來談談蔡先生的志事。蔡先生從十八歲當獼猴王起（充塾師），二十八歲時曾在李慈銘家中做了半年家庭教師，三十二歲，回家鄉主持中西學堂，此後歷任各級學校教師，和教育、學術機構的負責人，「統計蔡先生從十八歲起，即已開始教師生活，三十二歲以後，就從事學校教育工作，除了中間到國外讀書考察以外，始終沒有離開教育的崗位過。」所以他是教育為個人的終身事業的。左舜生先生也說過「他會以很短的時間做過官，但他不是為做官而做官，是為他的教育與文化事業而做官；他會不斷的到德國到法國去留學，也不是為成就他自己一個純粹學者的地位而留學，還是為他的文化與教育事業而留學；別人有他這樣的心，不必有他這樣的學問；有他這樣的學問，也不必有他這樣的眼光和魄力！」吳稚暉先生另有段談話和左先生的見解不謀而合，他說：「在民國初年，請他擔任教育部長，他並不推辭，因為這個任務，可以實現他的主張。到了十七年時候，國民政府成立五院，那時他本想做考試院院長，因為考試工作，和他生平的主張有很大關係

，可以從這裡來發揮他的主張，達成他的目的。所以當時他不做監察院院長。他說：我是好好先生，怎麼可以做監察事情？後來設立中央研究院，他去擔任研究院院長，心裡很高興。這並不是因為可以做官，也是因為這個任務和他的意志相近。」至於「他對於大學的觀念，深深無疑義的是受了十九世紀初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大學者的影響（英國著名史學家谷德 G. P. Good 稱，當時柏林大學的建立，是十九世紀一件大事）。蔡先生和他們一樣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但不主張，而且反對。」這是他留學德國所受的影響。而「他在法國的時候，受到兩種思想的感應：一種是啓明時代一般思想家對文藝和科學的態度，以後他並贊成孔德（A. Comte）的實證主義；一種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自由、平等、博愛」的號召，所以他主張民主。」另外他對於法國大學區制度的醉心，也不妨說是留法時的一點收穫，所以他的留學德法確實不只是為了成就一己，却與他整個的教育、文化理想大有關係。

說到蔡先生的志願，和他相交四十年的稚老很簡要地指出「然而他無時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張：鼓勵造就大學問家出來。別人辦普通教育，像辦工程教育等等，他也給予很多的幫助，而他畢生最致力的是辦大學。」毛主席先生也說蔡子民和胡適之兩先生「從我認識他們的時候起，一直到他們去世的時候，他們似乎沒有一刻不想到把我們民族的文化以和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相競，沒有一刻不想

到使世界上的好人漸漸增多起來。他們把這兩件事情作為他們一生中最大的使命。」正因蔡先生有他個人遠大的理想，一生奮鬥不已，因此不能有太多的時間，來從事他所喜歡的學術工作，加以「他是從中國傳統的博學風氣裡面陶鑄出來的一個人，對於學問的興趣非常廣泛。」所以蔡先生並不會留下什麼等身的著作，即使像「中國倫理學史」這樣的創作，也因成書年代的久遠（一九一〇），而不能盡符今天嚴格的學術要求。「可是也正因為他是一面學，一面教，一面做事，一面讀書，其所留給一般後輩的影響，乃決不在梁啟超、嚴復、王國維諸人之下。」

綜論蔡先生的一生，他始終不失書生本色，革命從教育入手，為了提高民族的地位也想藉助教育之力，而他個人則不斷的進修，「學不厭、教不倦」（自書橫額），「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自題畫像），難怪有人要說他是民國的「素王」了。林語堂先生推崇蔡先生「在革命元老中，我認為他比較真正認識西方思想。他書真正看，而思路通達。對西方思想有真認識，是不容易，否則班門弄斧，人云亦云而已。所以以他的道德文章，來長北大，再好沒有，當然使北大發出異樣的光輝。」總之蔡先生的立身行事處處都表示他不過是個書生，但確是一個出色的書生，而在他所處的時代裡，他則是少數真正過渡了的人物。詩經上說「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蔡先生的志事與平生應該能給我們帶來不少的啓示。